

# 操纵理论视角下的儿童文学翻译研究

## ——以《水孩子》为例

袁月 马晓梅

北京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北京 100124

**摘要:** 儿童文学一直是文学领域重要的组成部分, 中国儿童文学“萌芽”于晚清, 在“五四”时期作为一个独立的分支而被确立。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为人们开辟了广阔的新视野, 使人们将目光转向历史文化和文本操纵层面, 以更宏观的历史文化语境考察翻译活动和翻译作品。儿童文学作为儿童成长教育的重要载体, 越来越受到国家、社会的重视, 是跨文化交流中文化渗透的重要一环。本文以操纵理论为指导, 以童话作品《水孩子》为例, 从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这三个操纵因素对翻译活动进行深入分析, 探究儿童文学作品引入中国的特定历史文化背景及操纵因素对翻译行为产生的影响, 以期为新时期的儿童文学教育发展带来启示和经验, 推动国内外的儿童文学更好的交流互促, 把优秀作品“引进来”, 以优异质量“走出去”。

**关键词:** 儿童文学; 《水孩子》; 操纵理论; 翻译研究

### 引言

儿童文学是文学领域重要的组成部分, 中国儿童文学“萌芽”于晚清, 在“五四”时期作为一个独立的分支被确立。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离不开对外国儿童文学的译介, 早在二、三十年代便进入翻译热潮, 不同国家、内容、题材的儿童文学作品被大量译介到中国。儿童文学作为儿童教育的重要载体和抓手, 承担着提高学习能力、启迪儿童智慧、培养道德品质的重要责任。“少年强, 则国强”, 抓好少年儿童的教育工作是时代赋予的责任,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 要深入推动教育对外开放, 统筹“引进来”和“走出去”, 不断提升我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竞争力和话语权。翻译作为纽带推动了外国儿童文学作品的引入与传播, 为中国儿童带来的崭新的文学面貌, 为儿童的成长成才与教育发展提供了充分的服务与支持, 促进了文学层面跨文化的交流和传播。

本文以英国作家查尔斯·金斯的童话作品《水孩子》为例, 通过勒菲弗尔提出操纵理论, 分析特定历史时期意识形态、诗学以及赞助人这三大要素对儿童文学作品翻译活动和翻译策略产生的操纵影响, 总结特定社会环境背景, 以期为当今儿童文学的选择和译介提供经验, 为推动儿童教育事业贡献更多力量。

### 1.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操纵理论

九十年代, 翻译领域发生了“文化转向”。勒菲弗尔(1992)在《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操控》的序中写道: “翻译当然是对原文的改写。所有的改写, 无论其意图如何, 都反映了某种意识形态和诗学, 并因此操纵文学在特定的社会中以特定的方式发挥作用。改写是一种操纵, 是为权力服务的, 其积极的一面有助于文学和社会的发展”。勒菲弗尔的操纵改写理论并不意味着译者可以随心所欲地对原作进行加工, 他对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这三方面进行了解释。

“意识形态”是“一套争夺利益的话语, 这些利益在某种程度上与维护或质疑对整个社会和历史生活形式至关重要的权力结构有关。”具体而言, 意识形态是一个概念, 指的是一套特定的和一般的思想、价值观和信仰。意识形态往往会对翻译作品主题的选取和表现主题的形式产生限制作用。“诗学”是指文学系统拥有的某种行为准则, 包含必要的组成部分和功能性成分。诗学系统由两个部分组成: 一是各种文学手法、体裁、主题、典型人物、情景以及象征等, 二是文学在整个社会系统中的作用(文学应以怎样的方式, 或被允许以怎样的方式对社会发挥功能)。后者主要影响文学作品主题的选择, 即文学作品的主题必须与社会文化系统相关且一致, 这一过程体现了权利的作用。“赞助人”

被定义为“在鼓励和宣传文学作品方面具有影响力的任何一种力量，同时也在打击、审查和摧毁文学作品方面具有影响力。”(Gentzler, 2004) 有意识形态的、经济的和地位的三个方面，包含个人、团体以及规范文学和文学思想传播的机构等，这些也是权力的体现。他们施加影响是为了确保“文学系统的步调不要与社会的其他子系统离得太远”(Lefevere, 1992)。

总体来说，意识形态和赞助人从文学系统的外部操纵着文学作品的总体走向，诗学从文学系统内部把握着文学作品的形式与表达。

## 2. 《水孩子》简介及其译介情况

《水孩子》创作于 1862 年，最先发表于麦克米兰杂志上，作者查尔斯·金斯莱是 19 世纪英国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童话讲述了一个扫烟囱的男孩汤姆，偶然落水变成了一个水孩子的故事。他在捉弄同伴、欺骗仙女的过程中受到惩罚，浑身长满尖刺，最后在仙女的教诲引导，成长为一个热爱真理、正直、勇敢之人。

30 年代是《水孩子》译介的高峰期，有 8 个译本纷纷出版。1931 年 8 月出现了第一个全译本，由王清溪翻译，译本以独特的翻译手法完整介绍了故事内容。尽管随后又有杨镇华（1931）、赖恒信和肖璐峰（1932）、王实味（1935）等新译本产生，但最受关注仍是儿童书局出版的王译本。翻译的目的是为读者服务，它是推动世界文化发展的一种重大力量，我们应该站在跨文化交流的高度对翻译活动进行思考，以维护文化多样性为目标来考察翻译活动的丰富性、复杂性与创造性（谢天振，2021）。国内学者对《水孩子》的研究大多停留在文学层面上，缺少对特定时期历史背景和文化翻译层面的探究。

## 3. 操纵理论视域下《水孩子》翻译现象

从翻译学文化视角看，翻译作为一种文化选择行为，容易受到目标文化语境、占据主导地位意识形态、主流诗学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查明建，谢天振，2007）。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儿童文学翻译深受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和主流诗学的影响，对翻译选择和翻译规范发挥了重要作用，赞助人更是成为影响作品出版的重要因素。

### 3.1 意识形态的操纵

30 年代主流社会意识形态深受新文化倡导的民主与科学的影响，逐渐催生出新儿童观，中国现代儿童事业的发展

迎来了曙光。“儿童的发现”是社会的一大进步，五四时期对个性解放、人格独立、民主自由等思想的追求不仅促进了社会思想解放，推更动大众在发现“人”的同时发现“儿童”。一方面，1919 年杜威访华为中国带来了“儿童中心主义”，两年时间内，他在国内多地进行演讲，推动了人们从“父为子纲”到“幼者本位”的儿童观念的转变，促进了儿童教育观念的革新。他提出“把一般目的转化为关心儿童个别差异的目的”，要充分考虑到儿童的爱好和兴趣，教育要遵循其自然发展规律（王承绪，2001）。在此观念引导下，为儿童服务、满足儿童发展需求成为文学创作的根本目的。另一方面，国内先进思潮的广泛传播使文人志士们关注到儿童这一弱小主体，“儿童的发现”成为文学发展的重要动力。鲁迅率先发出“救救孩子”的呐喊，对封建礼教扼杀人性的现象进行严厉批判。他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指出西方对孩子的误解是“以为成人的预备”，中国人的误解是“以为缩小的成人”，但孩子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一切设施都应该以孩子为本位（鲁迅，1919）。周作人也说，要将儿童视为“完全的个人”，1920 年在北京孔德学校演讲时提出了“儿童本位论”，重点指出了儿童具有独立性，儿童的“内面的生活”与大人不同，要理解并尊重他们的个性发展。他提出要更加细心斟酌地为儿童提供“空灵的幻想与快活的嬉笑”的文学作品来帮助孩子心灵成长，满足儿童审美需求。这篇文章明确提出了以儿童为独立存在、肯定儿童精神和社会地位的“儿童本位”的儿童观。

《水孩子》此时被译介到中国因为其符合社会意识形态。王清溪（1931）在译者序中写到“全书活泼，动情，生趣，充满了欢笑与悲伤，是金斯莱给他的孩子们所写的”，作品鲜明地指出了其写作对象和目标读者是儿童，是为儿童服务，选材方面完全符合儿童本位意识形态要求。此外，他在翻译时还删除了关于建筑风格、社会历史、宗教礼拜、严格训诫等例子的详细描述，将晦涩难懂、阴暗复杂的信息剔除出去，照顾了中国儿童的阅读水平和思想认知。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始终坚持以儿童为中心的宗旨，对儿童文学的译介不再以“载道”为目的，而是更加具有“儿童化”特色。这样的翻译受到了儿童的欢迎，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他们的阅读体验，在 30 年代为儿童带来了更为新颖丰富的阅读内容。

### 3.2 诗学的操纵

诗学作为一种文学观念，决定了文学应该是什么样子。

主流诗学对译者翻译行为影响主要体现在文学手法、语言特点、典型人物、情境等方面。首先从文学手法上看,当时处于社会变革时期,白话文成为主流,“直译”成为人们争论的焦点,鲁迅作为直译的倡导者和奠基人,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1930)一文中指出新造的句子“更能保存原来的精悍的语气”,“硬译”可以丰富中国的文法。他还强调“宁信而不顺”,在这里他遵循翻译应该“通顺”、“忠诚”的原则,但可以将新的表达方式、语法、词汇输入中文,推动中文的创新发展。王清溪与鲁迅是好友,受此诗学影响,他更多以直译忠实为原则翻译此书。而且王清溪于1921年在上海麦伦书院专修英文,随后担任过中学教师和翻译编辑工作,具有良好英语水平和教育背景,作品具有明显的个人诗学特点。他善于灵活运用各种修辞手法传达原文意趣。例如,他将落荒而逃的汤姆比喻成“将死的狐狸(a hunted fox)”、“一只黑猿(a small black gorilla)”、“老的爱克斯摩牡鹿(an old Exmoor stag)”等,将汤姆卑微的形象活灵活现地展现出来,将“hunted”译为“将死的”,通过字词的改写,突出了情节的紧迫,增添了趣味性和生动性,使之更能贴合儿童读者的阅读需求和兴趣,既遵循直译手法又体现个人特色。

另一方面,从语言特点看,金斯莱在原著中写了不少诗歌,以诗歌唤起儿童心灵共鸣。王译特别注重诗歌的翻译,在韵律、字词等方面都进行了细致处理。

例1 Clear and cool, clear and cool,

By laughing shallow, and dreaming pool;

Cool and clear, cool and clear,

By shining shingle, and foaming wear; (Kingsley, 1862:283)

.....

清洁呀凉爽, 清洁呀凉爽,

在欢笑的水池和梦幻的池塘之旁;

凉爽呀清洁, 凉爽呀清洁,

在灿烂的砾石和飞沫的坝闸之侧; (王清溪, 1931: 54)

王清溪在翻译诗歌时采取了自由的形式,且充分保留了诗歌韵律和形式美。原文采用“cool”、“pool”和“clear”、“wear”同韵结尾,译者翻译时用“爽”、“旁”,“洁”、“侧”,在平仄上形成了音律美,“shuang”“pang”、

“jie”“ce”两组同韵,在韵律上的一致使译文读起来通畅优美。在句式方面,译者将二、四句中两个短句合成一句,采用“在.....和.....之旁”的句式,将英文原句进行了改写,在保留原文对仗工整的形式中使句子更加流畅易懂,衔接自然。整首诗歌在翻译时采取了自由的译法,对诗歌翻译形式进行了创新。王清溪用自由的形式传达给儿童美妙的阅读体验,在创新中文诗歌体裁形式的同时也保留原文的韵律美、意境美。

最后,王清溪在典型人物称谓上也进行了改写,使之贴合国内文化和儿童读者。译文中将 Sir John Harthover 翻译成“约翰·哈沙佛老爷”、将 fairy 翻译为“神仙”、将 Mrs. Doasyouwouldbedoneby 翻译为“赏罚夫人”,这些词汇都是中国特有的人物称呼。译者在翻译人物称谓时使用了蕴含长幼尊卑、三纲五常等级观念的词汇,体现传统文化内涵,是一种归化策略。译者在诗学观指引下,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社会现实背景和儿童阅读水平,充分了解了故事内容和人物形象并进行归化改写。

王清溪在中国主流诗学影响下以直译为主进行翻译,保留英式自由句法的同时运用了改写的翻译策略,在阅读风格上进行改写和创新,充分满足儿童的阅读需求和体验,体现了一种“中西合璧”的跨文化交流做法。

### 3.3 赞助人的操纵

朱耀先(2007)在《论翻译与政治》一文中便写道“翻译活动受目的语文化中赞助人的操控,这是影响和制约翻译活动的有形的权力。”《水孩子》能够被译介出版,离不开特定时期出版社、赞助人背后权力运作的影响和支持。

《水孩子》成功出版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文学团体对其产生的权力操纵。首先要提到的是左联,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成立于1930年3月2日,在政治、思想、文化、文学等多个方面开展活动。30年代,儿童文学作为革命文学的一翼受到重视,他们把儿童当作自己“新时代的弟妹”,热切关心、悉心扶植着儿童文学这株弱小但生命力旺盛的幼苗(蒋风,2018)。此时文学出版资源还比较紧张,文艺工作者除了提升自身作品质量外,还需要提高自己的名声、扩大自己在文坛和文学出版界的人际关系网络,在这种情况下出面组建或参加文学社团无疑是一种可行的办法(邓集田,2009)。《水孩子》的译者王清溪与左联有着紧密的关系,他与左联核心创建者柔石是同乡、校友兼好友,1926

年两人共同参与宁海中学的筹建事宜,1929年两人又同到上海结识了鲁迅,三人在相互扶持中建立了紧密的关系。此外,他还受雇于洋行任翻译,工作之余从事翻译小说,并且帮助柔石和鲁迅校译文章,也就是在此阶段,王育和以“王清溪”为笔名,单独译出北欧进步小说《水孩》在沪出版发行。王清溪通晓英文且潜心于教育事业,可以独立阅读翻译英文原著,翻译质量有保证,加上他结识的柔石、鲁迅等人在左联内部和文学界有相当大的话语权,这些都构成了该书出版的有利因素。

另一方面,儿童书局对儿童文学的重视也推动了该作品的翻译出版。1930年2月,张一渠和石芝坤合资创办了中国第一家以出版儿童读物为主的书局——儿童书局。儿童书局特别重视儿童文学出版,其主旨首先在推进儿童教育,注重儿童的阅读能力和适应性,还积极挖掘并培育丰富的出版文化资源,即从外来文学资源的译介和对传统文化的整理汇编双重维度进行(朱利民,2016)。张一渠还曾邀请自己的老师周作人为书局撰文,大大提升了书局“档次”(王林,1998)。儿童书局大量出版各类儿童文学佳作,展现了它对儿童文学的重视。金斯莱的《水孩子》新颖独特,充分关注儿童心理和道德教育,利于服务儿童蒋康成长,此前还未被完整翻译过,符合儿童书局的发行需求。

左联是《水孩子》的隐形赞助人,儿童书局为其出版提供了有利平台,社会层面对儿童教育的关注使得《水孩子》进入中国译者的视野。由此可见,服务教育儿童的主题渗入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赞助人对儿童群体的重视促进了该作品的译介和传播,儿童文学的发展和儿童的成长教育也都获得了有利的帮助。

#### 4. 结语

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自始至终离不开对外国儿童文学的翻译,优秀的外国儿童文学作品始终值得人们学习借鉴。早期作品的选择和译介受到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等因素的操纵,仅以《水孩子》为例,其翻译就经历了社会环境和专业人员的严格选择,对当时儿童的成长教育发挥了推动作用。不仅开阔了儿童的视野,提升了认识水平,更增强了他们的阅读学习能力,推动了中国自己的儿童文学事业发展壮大。新时代下,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需要以儿童为中心,以儿童教育发展和成长为目标,以翻译为交流手段,融合具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内容,“展现中国之美,融合世界之长”,

对各种复杂操纵因素进行有益分析、有效利用,推动儿童文学向好向上发展,走向更广阔的国际化舞台。

#### 参考文献:

- [1]查明建,谢天振.中国20世纪外国文学翻译史(下)[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
- [2]邓集田.中国现代文学的出版平台[D].华东师范大学.2009:49-50.
- [3]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M],王承绪,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83.
- [4]蒋风.中国儿童文学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95-96.
- [5]鲁迅,1930.“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DB/OL],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新文化运动馆).<http://www.luxunmuseum.com.cn/cx/content.php?id=1678>
- [6]鲁迅.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7-19.
- [7]王林.张一渠——中国第一家儿童书局的创办人[J].文史杂志.1998(01):46.
- [8]王清溪.水孩子[M],上海:儿童书局.1931.
- [9]谢天振.重写翻译史[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
- [10]朱利民.儿童书局的经验与启示[J],出版史话.2016(09):58-61.
- [11]朱耀先.论翻译与政治[J],中国科技翻译.2007(20)1:34-34.
- [12]Gentzler, E.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M]. Revised second edition.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 [13]Kingsley, C. The Water Babies[J]. Macmillan's Magazine.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London.1862(vol6):273-283,433-444.
- [14]Kingsley, C. The Water Babies[J]. Macmillan's Magazine.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London.1863(vol7):95-105,383-393.
- [15]Lefevere, A.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M]. London: Routledge. 1992. 2-6.

#### 作者简介:

袁月(1998-),女,汉族,北京,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翻译与跨文化。